

地方党史漫谈

革命老区溪口镇

中古有两个溪口镇，一是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位于长兴南翼；一是张家界慈利县西南部的溪口镇。

1986年8月，我从大学毕业，被县教委分配在坐落于溪口镇的慈利三中工作多年，风景秀丽的溪口镇相当于我的第二故乡。此后三十多年，我多次细细游览溪口镇，观赏其土家建筑，体验其土家风情，发掘其古村历史文化，温习其革命

戴楚地红色文化，溪口镇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溪口镇是慈利县三大古镇之一。老街社区（居委会）康乐街仍然保留着土家吊脚楼的原始风貌，被鞋底磨平的一块块石板，记录着岁月的沧桑。漫步在长达三里的青石板巷道上，仿佛在穿越历史的时空。

溪口镇古香古色，游览胜地颇多。有明清时期的古街、将军山、红岩壁和五狮寨等多处名胜古迹。走进溪口镇，古朴的挑廊式吊脚楼，小桥流水式的美丽村庄，都令人流连忘返。

自古以来，溪口乃澧水名埠、湘西门户，地理环境独特、水陆交通便利，曾为水运船夫之驿铺、兵家必争之要地。溪口位于澧水中游，因在杜家溪、九渡溪流入澧水的出口处而得名。根据《民国慈利县志》载：溪口者，蒙杜家溪口以为名也。溪口三面环水，境内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山势层峦迭嶂，水势蜿蜒曲折。西北濒临澧水，山势稍低，间有渡坦坪、杜家坪和坪等河谷平地。溪口青山如黛，绿水环绕，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呈现出流动的山水画面。溪口风光旖旎。俯瞰溪口，澧水呈几字形环绕古镇，从陶家嘴流到长潭，全长三十多里。唐代著名诗人张九龄踏看溪口九渡溪后，写有长诗《九渡仙楼》。澧水河岸悬棺岩墓亘立绝壁中间，成为民族研究专家学者寻幽访古之处。

明清时期，溪口经贸逐渐昌盛，发展成为繁华集镇。凭借舟排之利，从溪口沿澧水而上可通永定、桑植等县，沿澧水而下可达慈利、石门、澧县、安乡等县。千百年来，许多船夫、商贾和文人墨客频频光顾溪口。明清时期，溪口曾是闻名遐迩的商贸中转站和农产品集散地。清代末期，溪口约有货船60只，运输兽皮、茶叶、杜仲、木材、桐油、苎麻、梨子、柑桔、柚子和黄豆等农副产品到津市、汉口等地，再从城里运回食盐、布匹、铁锅、水缸、瓷碗、煤油以及百货等生活日用品就地销售。明清时期，澧水河道异常繁忙，货船穿梭来往，白帆点点，号子声声。溪口商店密布，经济繁荣。每逢场期，热闹非凡，一片欣欣向荣。商家善于经营，生财有道。为了招揽生意，在每年农历6月23日举行“关夫子会”，举行打蜈蚣旗、扎故事灯等文娱活动。溪口物产丰富，野兔、河蟹、鲶鱼、竹笋、岩蛙、辣椒和药材等动植物品种繁多，土鸡、牛肉、酸肉、腊肉、香肠、炒米、丝糖、粉丝、粑粑和月饼等都颇具地方特色，琳琅满目。董和兴的面食、吴坤记的汤圆、老板的豆腐、羊儿垭的白糖闻名古今，一直被誉为溪口镇“美食四绝”。

溪口镇是土家族聚居区，是历史文化名镇，文化底蕴深厚，民族风情浓郁。明清时期，溪口城堡沿河而建，从河上码头至陶家嘴，全是一排排的土家吊脚楼，错落有致。在溪口镇，目前仍然留有先秦时期土家先民的璞榔岗遗址和樟树塔遗址。

修建于清代初期的望江亭，曾全是春江花月、渔歌唱晚的盛景。王槐初监修于清代光绪年间的溪口土家木屋花桥，横跨杜家溪之上，屋盖青瓦，四角飞翘，雕梁画栋。桥长50多米，宽约4米，两边摆有供人休息的长板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将士多次往返此桥，故又名“红军桥”。

溪口镇西面都是土家青瓦吊脚楼，楼台庭园，鳞次栉比；馆堂店铺，目不暇接。是实实在在的民间艺术之乡。在溪口镇，乡土文化浓郁，土家语歌、民间歌谣、纤夫号子、民间曲艺、打糍粑和饮酒会等民族习俗，已传承数百年。

溪口镇曾是苏区，境内革命遗址众多。目前仍完整存有溪口区王家坪乡苏维埃政府旧址、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旧址、红军桥等遗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溪口镇的英雄儿女们曾为中国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奔走不止。

1934年11月下旬，红六军团第十八师五十三团团长张振坤奉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之命率部向慈利县溪口镇挺进。击溃守敌朱陈凯部，占领溪口。12月上旬，湘鄂川黔省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袁任远带领红六军团地方工作部刘斌以及大庸县游击队队长李吉宇等人奔赴溪口，开展苏区工作，进行土地革命。组建中共溪口区委员会，彭振兴担任区委书记。成立溪口区革命委员会，李自元担任主席。溪口区革命委员会于12月派出得力的干部，发动贫苦大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王家坪、长潭坪、渡坦坪和泥落等17个乡革命委员会。成立溪口区游击队，李德刚担任大队长，辖有王家坪、长潭坪、渡坦坪和泥落等17个乡游击队。共有游击队700多人，挑选其中200多名青壮年补充到红军队伍。之后在各游击队扩大的基础上，成立溪口独立营。

1934年12月，湘鄂川黔省军区派遣袁任远亲自在溪口收编游杂武装队伍。1935年1月，贺龙和萧克等红二、六军团将领在溪口桃坪古樟树下阅兵，风展红旗如画；吸收游杂武装人员参加红军，编入红二军团第十六师十七团。1935年2月上旬，红六军团团长萧克率领红二、六军团主力出师慈利县，迎击国民党军郭汝森纵队。红二、六军团指战员在溪口开始反围剿战斗，揭开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军民反围剿斗争序幕。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设在溪口老街的白色洋楼王氏公馆，红军战士多在溪口的燕儿垭和长潭坪一带集结。2月8日，萧克指挥红二、六军团主力在澧水南岸溪口打阻击战，分路包围棉花山，打响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第一仗。

2011年，位于老街社区（居委会）东头的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及红军医院旧址被湖南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被张家界市委党史研究室评为市级党史教育基地。

因溪口镇古樟树上曾写有“红军万岁”，故古樟树也被溪口群众亲切地称为“红军树”。



山水相映 汤青摄影

民间采风

阳春里的阳戏

□张雪云

在崇山峻岭的大湘西，每到春二三月，惊蛰谷雨前后，人们便开始在田间地头做各种各样的农活，叫做“阳春”。做阳春是辛苦活、体力活，远非城市里的人认为若加上“白雪”两个字，便是件阳春白雪的事儿。好在土家人自有土家人的活法与乐子，再怎么汗水流，再怎么劳苦奔波，土家人面对翠生生的沟谷山坡，随便扯片树叶子，就可以木叶声声，随便扯起喉咙吊上几嗓子，就可以阿哥阿妹地回肠荡气，这其中，阳春，自然而然成了做阳春土家人的最爱。它是山尖阳春三月的戏，是坡岭丹凤朝阳的戏，是溪沟沟阳气暖暖的戏。

阳戏，相对于大湘西的老一辈人来说，并不陌生。或多或少都在乡村集市的草台上见过、听过、追过。甚至偶尔也能学着戏中人吊上两嗓子。

小时候，在村里的大柳树下、临时搭的草台子上、或是学校操场的空地上，总会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一搭没一搭地唱阳戏，多半作古正经，装扮艳丽。演唱的剧目繁多，有《劈山救母》《生死牌》等等。阳戏演唱着剧中人物的命运，或朦胧，或清晰，或欢喜，或忧伤。高亢的长腔，艳丽的服饰，倾巷而动的架式，带给人们巨大的喜悦。乡亲们的精神生活，因为这些剧目的到来，不再单调，不再寂寥。

老辈子土家人大多爱看戏、说戏、唱戏，尤其是阳戏。宁舍饭食和酒，不舍扬花柳。愿吃稀饭看戏，不愿在家白睡。宁愿吃腌菜看阳戏，不愿吃腊肉挑石头。每到元宵佳节，花灯、龙灯、龙船，和着阳戏，真是红灯万盏人千叠，香扇翩翩慢慢摇。

快完年，人们开始安心安心心阳春。

小时候的我，曾痴迷戏曲。模仿是一个孩子对喜爱的最好表达。懵懂的我，常用床单作长裙、围巾作丝带，扮成戏中的角色，长袖轻舞。母亲的陪嫁中，有一面大镜子，我就常在镜前自顾自左照右照，摘几朵花插在发间，用红粉笔拧碎做胭脂粉补双颊，用墨笔当眉笔描眉画线，感觉有那么几分像了，便学着戏中人咿呀呀唱将起来。至于胡乱地唱了些什么，自己也无厘头，不懂深浅。但却是极快乐的，想象着自己就是台上的主角，水袖轻盈，倾国倾城。那时候，我读小学，对戏曲的认识一知半解。可一颗热爱文艺的种子，在那时就悄悄埋下了。

生长在大湘西的村寨，我人生中最早听到的戏，要么是辰河高腔，要么就是阳戏。至于这有什么区别，我大概也是不懂的。后来读了书，知道首都北京以后，才渐渐晓得京剧等国粹艺术。但国粹太遥远，我们这种乡下的地方，能有辰河高腔和阳戏这样的地方戏剧表演，也是需要逢年过节，或是待阳春种了，秋收有了空闲时间。遇到大户人家办喜事，也会请来戏班子唱个三天六夜的。许多年过去了，一些儿时的记忆被淹没，又被唤醒，如果不是再次在大庸古城遇

见这个被称作中国戏曲活化石的剧目，我真的几乎忘了，忘了儿时还有那么一段美好而纯真的记忆。

凡事，不会平白无故，总有个起源，阳戏自然也是如此。历史颇为悠久的阳戏，到底是老百姓忙完阳春之后的娱乐，还是因山南水北的地域而名呢？是因为傩戏与阳戏同班演出，傩戏是为娱乐鬼神而演，称“阴戏”，而在庭前扎台所唱主要是娱人，祈福纳吉，故称之为“阳戏”？又或者起源于澧水之北，水北为阳，故为阳戏？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细细考证过，只是大致觉得，或许兼而有之吧，总之，这是来自历史深处的一种神秘的戏曲，好听，养眼，怡神，是民间文艺的精华，应该要好好传承下来。

源于这样的一种文化自觉，和对于非遗文化的热爱，这个暑假，正是八月酷热期间，我来到张家界永定区，有幸采访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张家界阳戏第十三代传承人周志家老师，聆听了他的故事，才得知更多之前不甚了解的宝贵知识，算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由此得知，阳戏这一独特的剧目，被誉为“三湘一绝，五溪奇葩”的阳戏，确实不一般。

大概是为了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大庸阳戏，周老师亲自给我们唱了一段。只见周老师站如松，缓缓吸气、运气，像似换了个人，一开腔，一亮嗓子，独特的唱腔就惊艳了全场，乐得我们也禁不住学着哼唱起来。只听他腔调圆润，腔韵流转，真假嗓结合，唱词用真嗓，拖腔用假嗓，不时翻高一个八度，声音极具穿透力，如果再配上锣鼓铿锵，可以说是高亢激昂，响遏行云。他唱的是阳戏中的正宫调，用假嗓拖腔的那部分，就叫做“金线吊葫芦”。而张家界阳戏最独特的地方，就是这个“金线吊葫芦”，有着极高的难度。阳戏之前也被叫做“杨花柳”，传统戏目中，多是才子佳人、恩怨情仇的戏。不过现在，适应时代需要，旧戏新唱，许多唱词、戏服和道具，增加了新的元素，出现了许多行业戏份，但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金线吊葫芦”的假嗓部分，不能丢失其灵魂。周老师说，唱阳戏得练好嗓子，嗓子练得越好，就能获更多的福禄。因此，他还讲了周氏家族兄弟家门口藤结八个葫芦（谐音福禄）的故事。

苦读寒窗十年整，求名知音家道贫，澧水泛舟八百里，涛声送我过洞庭。周老师七十有七，面色红润，身康体健，中气十足，说话抑扬顿挫，唱曲有板有眼，金线吊葫芦，吊得相当有韵味。对于大庸阳戏，周老师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不愧是张家界阳戏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本活字典。他说，阳戏，是张家界引以骄傲的地方文化，也是张家界人最为钟情的一种地方传统剧种，张家界阳戏是民间山歌演变而成，是土家人把山歌号子和地方戏剧相融合的一种独特的剧目。张家界有一句歇后语：敲着

空碗唱阳戏，穷开心，可见，阳戏深入土家族文化生活的骨髓，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是无法取代的。

慢慢地，在与周老师的深入交谈中，得知阳戏来源于傩戏，巫傩文化是阳戏的源头。如果说花灯戏是我们南方的二人转，那么阳戏，就该是傩戏和花灯戏结合民间音乐而演化的戏曲，过去叫“二小戏”，多是两人表演，一丑一旦，一问一答。据说阳戏起源于明末清初，悠久的巴楚文化艺术和多姿多彩的民间音乐歌舞，以及湘鄂渝黔边区丰厚的少数民族文化，为阳戏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和条件。

大约北宋时期，大庸地界，就有了古戏楼，也有了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表达生活喜怒哀乐的艺术形式。古往今来的历史和文化生活，包括音乐的、艺术的，都是有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演绎。据说，阳戏中的一些音律，多是民间艺人从劳动号子演变而来，还受到民间生活的启发，比如土家女哭嫁，甚至还能从古琴曲，以及屈原的《离骚》中找到一些影子。由此而知，音律曲调的背后，是大庸古城六百年的烟雨风情和锦绣繁华。

清康熙年间，张家界还不是张家界，是古色古香的大庸。相传覃氏兄弟喜唱花灯，于康熙年间外出四川挑盐，兄弟二人在挑盐途中常以演唱花灯解乏，路人颇爱听闻，问其所唱何调，答曰：“阳戏也！”自此便有了阳戏之名。可以认为，大庸土家族阳戏创始人为覃玉龙、覃玉凤兄弟。可以得知，大庸阳戏，发祥于永定十三都，即今张家界市永定区教子坪牛犀牛潭一带。当时，还没形成一个完整的剧种，只是民间的草台戏，也就是由民间音乐随心随意组合起来。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张家界阳戏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戏剧体系，传统剧目有一百多出，有了较为固定的唱腔，有激情悲愤、先声夺人的导板，长吁抒情的正宫，欢快轻松的悦调，滑稽诙谐的金钱调等十余种。

沈从文先生说：到了湘西，不看阳戏，等于只到了半个湘西。张家界阳戏代言人流云老师，从小就有很多的阳戏情节，他在苦难中励志成才，现在虽然退休了，依然致力于张家界文化和旅游的推广，是张家界旅游协会的创始人。他说：苦难造就一个人，甚至造就一个地方的品格。他把从文先生的话又加了一句：到了张家界，只看山水，不听阳戏，等于不了解张家界文化。他希望将阳戏融入当地的文化旅游中，既是传播，也是传承，这是彼此赋能，彼此双赢的结果，也是非遗艺术生命力所在。

许久以来，阳戏这婉转的唱腔，跳跃的鼓点，凄美的旋律，飘舞的水袖，带给张家界人太多的安慰与喜悦，灿烂与期许。阳戏承载着土家族的文化基因，无不呈现出特有的地域内人们适应自然、乐观生活的智慧与独特的审美情趣。当一个人来到张家界，除

看了奇峰秀水，若是有了对当地阳戏的欣赏和理解，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领略这个地方的民间文化精华，把握地方文脉，从而更深切地理解这块土地及土地上的有情众生。

时代的前行，社会的变革，同样使阳戏等地方戏面临消亡的危险，如有“湘西梅兰芳”之美称的丁祖雪，以及一些阳戏名家的优秀剧目和优美唱腔濒临失传，艺术传承后继乏人。说到这里，周志家老师不无感伤。老一辈阳戏人早已辞谢舞台，不少老艺人相继离世，中青年优秀人才又流失颇多，后继乏人。如今的年轻人，对这一传统艺术没有兴趣，即便有一些喜爱的人士，也因为从事这门艺术传承工作没有可靠的生活保障，而不愿做阳戏传承人，一些青年好苗子的确难得寻到。被称为“拼命三郎”的周老师，在一次舞台后累倒了，之后决心写书，出书，并自费出版，他已经写了几十本有关阳戏的书，致力于阳戏知识的普及，真心让人佩服。周老不断地鼓励女儿：多看书就是福，多助人就是福，阳戏人要为这一非遗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努力奔跑。张家界阳戏第十五代传承人周海燕老师，是阳戏剧团的团长，是周志家老师的女儿。被评为“微笑志愿者”的周海燕老师，从小耳濡目染，受父亲影响很深。她在做好演出的同时，一直在想方设法培养新人，并力促阳戏非遗进校园，志愿在土家孩子心中，播下一颗颗阳戏的种子。

土家人忙完了阳春盼丰收。都说秋分时节，仓廪可期，秋分是农民的丰收节，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你看那山川大地，田野稻田，黄灿灿的一大片，农人乐开了花。这个时节，春天播撒在田间地头的辛劳都变成了累累果实，每一分付出都得到金色的收获。为了欢庆丰收，为了慰劳一年的辛苦，也为了送文艺下乡，丰富乡亲们的文化生活，百花阳戏班子又开始忙碌起来了，扎台的扎台，化妆的化妆，拉琴的拉琴，欢喜喜，喜气融融，吹吹打打，咿咿呀呀，锣鼓铿锵，古柳树下新唱阳戏。你看，好一个热闹、喜庆、丰收的土家村寨，好一个五颜六色、色彩缤纷的丰收之年。

五月里来艾蒿青，采回艾蒿包粽忙。家家户户喜洋洋，大街小巷粽飘香。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也会轻轻地哼上几句即兴而来的阳戏词，一些烟火底色的日子便泛着新鲜和生动。其中浑厚的，仿佛是张家界土家山寨的三千奇峰，细俏的，仿佛是沟沟壑壑的八百秀水，绵密处，是土家儿女希望和美好生活的愿景；蜿蜒时，是天门狐仙的缠绵霞飞。我打着节拍，将来自土地深处的气息弥漫在锦绣繁华的星城上空，于心底飘荡出田野和山水间，一曲曲的高山流水，一幅幅的青山画卷，一处处的力量氤氲，至刚至柔，生生不息。

历史影册

著书立说不能急

□江舟

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曾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并担任过辅仁大学校长和京师图书馆馆长。陈垣先生从事教育工作七十多年，桃李满天下，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历史专家。陈垣先生在培养学生时，非常注重让学生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他尤其特别反对学生根基不深，便过早发表论文或者著作。陈垣先生常对学生们说，一篇论文或专著，作完了不要忙着发表。好比刚煮熟的馒头，须要把热气放完了，才能去吃。蒸的透透，熟熟，才能知道。陈垣先生还常教育学生，自己写出来的作品一定要给三类人看：一是水平高于自己的人，二是和自己平行的人，三是不如自己的人。因为这样做，可以从不同角度得到反映意见，以便修改。

黄侃先生是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1905年留学日本，在东京拜章太炎为师，受小学、经学教育，为章氏门下大弟子，曾任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大学教授。作为一代国学大师，他一生勤于读书，但留下的著作却很少。黄侃也非常反对学生急于著书立说。黄侃先生说，初学之病有四：一曰急于求解；一曰急于著书；一曰不能阙疑；一曰不能服善。因此黄侃曾说道：人五十之前不著书。黄侃生前，老师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黄侃终不为所动。后来黄侃因酒猝然离世，其身后留下的著作寥寥。章太炎在为黄侃所撰的墓志铭中写道：（黄）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然不肯轻著书。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黄侃不仅要求自己不要急于著书，还告诫学生30岁之前不要轻易发表文章。

学生殷孟伦回忆，黄侃常劝学生们要打好基本功，不要跨界，要耐得住久坐下苦功。殷孟伦还说：先生并告诫我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字，一则学力不充分，一则意见不成熟，徒然灾梨祸枣，遗人把柄，于己无益，于世有损。

